

徐盈提供
82.11.19 1331

我与商务是同龄

陈翰笙 口述

王文光 记录整理

为了纪念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我特地访问了革命老前辈、经济学家、史学家陈翰笙。翰老虽是85岁的高龄了，却像青年人那样，朝气蓬勃，在谈话中我不时为他那爽朗、乐观的情绪所感染。

同 龄

提起商务印书馆来，翰老笑着说：商务成立于1897年2月，我也是那年那月出生的，恰巧是同龄啊！算来，商务是一个有85年历史的出版社了。它走过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漫长道路。大家知道，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西方的先进科学和资产阶级新文化陆续传入中国，许多知识分子想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于是维新变革的思潮一时风行全国。商务印书馆适应了时代潮流的需要，它在上海开业，并站在资产阶级新文化一边，为提倡新学，兴办新学校出版了大量适合新潮流的书，作出了贡献。我在青年求学的时候，就读过商务出版的书，受到了启蒙教育。大概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或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都会知道商务印书馆的。

贡 献

谈到这儿，翰老略停了一下说：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全面地历史地看，不能苛求。商务是旧中国最早最著名的出版企业，是由私人开办的，当然也为了赚钱，但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办企业的人具有开明实业家的眼光，是卓越的企业家，他们出书的总方向是对头的，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是为了发展民族的新文化。据我所知它并没有为了赚钱出那些低级下流、黄色、污七八糟的书，而是出健康有用的书。它最早编印了新式教科书，为开办新式学校提供了启蒙课本；大量翻译出版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像严（复）译、林（纾）译和世界名著的出版，就为那些寻求救国救民求真理的人提供了学习材料，打开了眼界，受到了启发！可说是起了开拓者的作用。商务对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在积累文化知识上是很有成绩的。从这个角度看，商务是进步的出版企业之一。听说你们为了纪念建馆85周年，再版了严译、林译及世界名著一百多种，这是好事情，因为这些书不好找到了。了解了商务的过去，才会珍惜现在，也才会今后努力多出书，出好书，为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作出贡献。

缘 分

谈到这儿，我请翰老谈谈他同商务的直接关系。翰老兴奋地说：我同商务还是有些缘分的。我不只是读过它出版的书，还当过编辑。那是在1928年，根据党的指示，为了不暴露党员身份，我从苏联转道日本回国到了上海。那时王云五是商务的“老板”，要我到商务审查百科全书的稿件，计划整理、翻译

出版。这年夏天至1929年秋天我同商务订了一年的工作合约。于是成了商务的编辑。在审查稿件中，我发现稿子比较乱，质量不高，就把它分为三类：一类大约有六分之一，可以用；二类不到六分之二，可作为专门词条汇集出版；三类占百分之六十质量差，不能用。我把审查意见分类列表送给王云五裁夺。他看后很失望，觉得我审查的太严格了。不过从这件工作中我了解到商务出版了不少中外语文工具书，为学习提供了方便。离开商务有人介绍我到中央研究院的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有一批地下党的同志以此作掩护搞社会调查，我参加了调查日本纱厂的包身制，特别是女工受剥削的情况，写了调查文章揭露其侵略剥削的实质。因此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怀疑是共产党搞的。以后便转到农村作社会调查，积累了大批资料，出版了一些读物。商务印书馆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表了我们写的调查文章，为宣传新思想提供了阵地，这方面也应该予以肯定。以后随着日本疯狂侵华，我同商务的关系就中断了。但不管怎么困难商务还是坚持下来了。

新 生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商务也获得了新生，成了国家的一级出版社。出版方针更明确了，主要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和翻译出版外国古今的重要学术著作，也出版了一些国内有价值的专著。1959年商务出版了我编著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经济区域》。1962年为了普及外国史知识，商务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一套《外国历史小丛书》，并组织了编审委员会，历史学家吴晗同志任主编，我是编委，为它写过书、审过稿。不幸在十年动乱中它同吴晗一起罹难遭殃。1979年底恢复出版这套小丛书，我被聘任编委

会主编，协助商务制订了选题计划，已出版了50余种，今后将更有计划地出版。这是好事情。我们的青年一代是很聪明的，可是由于十年浩劫，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都遭到破坏，文化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贫乏，不知道世界的昨天和今天，常闹出不少笑话。要知道没有一定的历史知识是不行的，不知道世界的过去，就不能了解现在；不了解世界的现在，也就很难建设好我们国家。不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就不知道爱惜我们的社会主义。我要在有生之年帮助商务出好这套《外国历史小丛书》，以补教学之不足，提供世界史知识，为青年人做点有益的工作。

经 验

谈到这里，我请翰老谈谈过去商务有那些好的作法值得学习。翰老想了想说：商务的历史很长，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应占有重要地位，它有许多做法是值得研究、借鉴。也可以说是经验吧！据我观察，有如下几方面值得重视：一是有一批热心于出版事业的人，从商务的创办人到具体主持业务的人，多数有学问，事业心强，眼光看的远，又脚踏实地办事，所以能推动事业不断发展。二是能接受新思想，有革新创造的精神，商务业务的不断发展，印刷技术不断改进，有一套企业管理的科学方法，这一切都离不开这种精神。那时竞争厉害，因循守旧就难维持下去。现在翻翻过去商务出的书，从内容到印刷都是不错的。三是重视人才，一方面同社会上的学者、专家保持联系，请他们写书、翻译出版，一方面注意搜罗人才，不断加强编辑力量，像沈雁冰、胡愈之、叶圣陶这些老前辈都在商务当过编辑。它还注意培养年轻编辑，不断提高业务水平。由于编

辑力量较强，保证了书籍质量，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四是摸索了一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和可行的制度。我说的这些不一定全面，但值得今天从事出版事业的同志研究、借鉴，会使出版工作搞得更好。

建 议

谈着谈着不觉近3个钟头了，我请翰老谈谈今后如何搞好出版工作。翰老说：出版是向人们提供精神食粮的，总要跟上时代的潮流。现在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出版更好的读物。建议商务考虑：一是成立编辑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编辑和有成就的编辑参加，以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展，加强业务指导；二是充实编辑队伍，除继续加强社会联系外，应了解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和研究生状况，业务对口或适合作编辑工作的，调来充实编辑力量。同时有计划地培养在职的年轻编辑，使他们增长知识、增强才干；三是设法加快出书的速度和提高印刷质量。建议商务收回或建立自己的印刷厂；四是根据出版方针除继续出好原有的书外，应办几种刊物，以普及中外文化知识，过去商务办过几种期刊，起过积极作用。今天，办期刊更有条件了。

总之，商务作为国家的一级出版社，是大有作为的。只要想着国家的需要，读者的需要，就会奋发前进，出版更多更好的书，为四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原载1982年2月14日香港《文汇报》）